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人性的推求：18世纪 英国小说研究

An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Studies of 18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曹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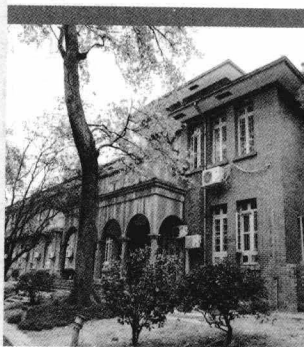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人性的推求：18世纪 英国小说研究

An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Studies of 18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曹波/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曹波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437-0

I. 人… II. 曹… III. 小说—文学研究—英国—18世纪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7426号

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

作 者: 曹 波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责任校对: 张 戈 马桂英

特约编辑: 张克修 苏小朋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67078243(总编室),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33(发行),67078255(办公室)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毫米 1/16

字数: 285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437-0

定价: 35.00元

“This literary traditionalism was first and most fully challenged by the novel, whose primary criterion was truth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individual experience which is always unique and therefore new.”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Penguin Books, 1981, p. 13.

“这种文学上的传统主义第一次而且最全面地遭到了小说的挑战。当时,小说的基本准则是忠实于个人经验——总是独特因而新鲜的个人经验。”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企鹅版,1981年,第13页。

“The provision, then, which we have here made is no other than *Human Nature*. ……a cook will have sooner gone through all the several species of animal and vegetable food in the world, than an author will be able to exhaust so extensive a subject.”

——H. Fielding,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London: Wordsworth Classics, 1999, p. 7 ~ 8.

“这里替读者准备的食物不是别的,乃是人性。……一位作家要想将人性这么广阔的一个题材写尽,比一位厨师把世界上各种肉类和蔬菜都做成菜肴还困难得多。”

——[英]亨利·菲尔丁著,萧乾、李从弼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9~10页。



序

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赋宁和陈嘉等学术前辈便有相关文论问世。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我国学者对18世纪英国小说给予高度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少著作和文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与国外同行的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其中最出色的当属中国社科院黄梅研究员的学术成果。事实上，向来崇尚执着与创新的中国学者不仅能以独特的视角来探讨18世纪英国小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而且在专业和学术上已经变得相当成熟，并完全能与外国同行展开平等的、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了。

曹波博士撰写的《人性的推求：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一书为我国的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曹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这部著作既包含了他近几年的学术兴趣，也体现了他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深刻思辨，其间不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这部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18世纪英国小说演变过程与艺术特征的断代史作，充分揭示了这一时期英国小说的概貌和样式，能使读者一书在手，18世纪英国小说尽收眼底。其次，这部学术著作以人性为主题，从经济、政治、道德、文化和情感等层面来探讨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以中国学者特有的目光深度考察了18世纪英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今天，当“以人为本”成为文明世界的一种基本理念时，当个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并有效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时，对人性的推求无疑是当代文学批评难以回避的课题。显然，曹波博士的研究不仅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也反映了一位年轻学者对经典文学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关注与反思。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并且成为英国文学遗产中



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顽强崛起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今天，重新回顾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轨迹时，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英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与转型之际，作家和读者的审美意识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昔日的宗教寓言和骑士小说已不再走俏，因为当时的读者似乎更渴望了解现实生活，并希望小说的故事是真实的。

二、18 世纪的优秀小说大都体现了追求表现个人主义的创作倾向。小说家们纷纷抛弃了以往的罗曼司和寓言小说留下的创作模式，将创作视线转向了“现世的”（secular）生活，追求表现个人“世俗的经验”（profane experience）。18 世纪的小说热衷于反映凡夫俗子在生活中的沉浮与荣辱，并有意将个人的行为从神圣的世界中剥离，从而使个人主义堂而皇之地取代了以往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显然，18 世纪小说在将个人经验作为最终的现实加以描写的同时，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现世神话。这无疑是它备受青睐的关键所在。

三、18 世纪英国小说在体裁和艺术形式上均体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充分反映了作家的个性与才华，而且已经成为作家开拓创新的实验场。虽然小说家们不谋而合地崇尚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他们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形式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便导致了小说体裁和艺术形式的多元化。18 世纪的英国小说种类繁多，样式层出不穷，手法精彩纷呈，如笛福的个人传记小说、斯威夫特的讽刺游记小说、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菲尔丁的史诗型喜剧小说和斯特恩的实验小说等等。毋庸置疑，体裁和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是 18 世纪小说全面崛起和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推求人性是对文学主体的研究，也是对历史上人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生存意识的反思。有道是，文学即人学。小说不仅是社会中错综复杂的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缩影，而且也是作家探讨人的话语权力、社会角色和主体意识的重要场所。通常，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真实地反映了人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的生存意识，折射出耐人寻味的世道人心和人间情怀。作为国民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微型载体，小说在刻画人性方面与诗歌和戏剧相比不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本书是曹波博士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全面盘点，也是他对当时英国的道德风尚和价值体系的人文思考。书中不乏作者的精辟论断和真



知灼见。如果说，18 世纪英国小说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境遇和命运，那么曹波的研究则为我国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助于我们从小说中观照人性，从人性的推求中观照小说。

李维屏

2009 年 6 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英国小说的成长 / 10

第一节 远亲与近亲 / 10

第二节 胚胎：中世纪的叙事文学 / 14

第三节 雏形：16 世纪的传奇与小说 / 16

第四节 成长：17 世纪的特写与小说 / 21

第二章 英国小说的崛起 / 31

第一节 小说的尴尬 / 31

第二节 历史的语境 / 35

第三节 创作的对话 / 41

第四节 小说的崛起 / 43

第三章 笛福的传记小说：经济人的创业神话 / 47

第一节 鲁滨逊：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 / 48

第二节 辛格顿：海盗生涯 / 63

第三节 弗兰德斯：荡妇与惯偷 / 66

第四节 罗克莎娜：情色商人 / 69

第四章 斯威夫特的游记小说：政治人的乌托邦 / 75

第一节 寓言故事：政治观念的故事化 / 76



第二节	人性的堕落与讽刺的机锋	/ 80
第三节	格列佛的异化：从经济人到政治人	/ 90
第五章	理查逊的书信小说：道德模范与自觉意识	/ 104
第一节	帕梅拉的“美德有报”	/ 106
第二节	克拉丽莎的两场战争	/ 123
余波	男性道德的楷模	/ 131
第六章	菲尔丁的喜剧小说：自然人性与世相全景	/ 133
第一节	男性的美德与塞万提斯的精神	/ 135
第二节	自然人性与世相全景	/ 140
余波	写作的回归	/ 160
第七章	斯特恩的实验小说：情感主义的德行	/ 163
第一节	奇人与奇书	/ 164
第二节	《项狄传》：情感主义的德行	/ 169
第三节	《深情之旅》：情感主义的善行	/ 183
余波	柔情与矫情	/ 187
第八章	18 世纪下半叶的小说：批判、哥特、女性	/ 189
第一节	斯摩莱特的游记小说：传承与批判	/ 190
第二节	华尔浦尔的哥特小说：怀古与恐怖	/ 198
第三节	“蓝袜子”系列：意识的觉醒与身份的搁置	/ 205
余语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基本走向	/ 214
附录一	19 世纪（哈代）小说中的人性推求	/ 217
附录二	20 世纪（贝克特）小说中的人性推求	/ 227
参考书目		/ 237
后记		/ 242



绪论

探讨英国小说的起源、崛起和流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小说”一词的历史和定义。一般认为，古代英语小说可以上溯到中世纪以前的叙事诗歌和英雄传奇，其发展步伐与古代汉语小说的历史基本同步，^①而现代意义上的英语“小说”则起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但当时的小说奠基人尚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没有清晰地觉察到自己实际上在创造一种新的而且更加灵活的文类（genre），一种能与荷马时代的史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并驾齐驱、能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散文体裁——因为理论的反思总是滞后的。因此，隐约察觉到自己的作品与先期的“罗曼司”（romance）既有微妙的相似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性，最初的散文作家就多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新罗曼司”或“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之类，仿佛他们只知道在人文主义和民主精神的感召下，自己正在将文艺创作的焦点从神祇和贵族“英雄”（hero）放低到中产阶级大众（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大众）——当然，这一转折离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anti-hero）相距甚远，但毕竟巩固了文学从神学到人学的发展趋势，因而是一种不容质疑的历史性贡献。于是，在各类小说风起云涌数十年之后，或者说“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②英语小说才被确切地用“novel”一词来加以指称和归纳，其文学上的贡献才以语言的形式记载下来。

英语中的“novel”一词本意是“新奇的，”仿佛18世纪末的英国文坛陡

① 中国古典小说萌芽于先秦时期（小说、小道），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短书、笔记小说），成熟于唐宋时期（传奇、话本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并初步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基本形式（长篇白话小说）。而中国现代小说起始于维新运动时期，当时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地位也空前提高，大有跃升为“大说”或“大道”之势。

② 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然间发现，散文体叙事作品已经发展成与诗歌和戏剧不相上下又充满奇异特质的文类了，故称之为“新奇”的作品。论述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与小说兴起的关系时，伊恩·瓦特（Ian Watt）也指出，“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①可见，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这一定义包含了命名者对新兴文类的肯定和赞赏，然而汉语中“小说”的命名则似乎充满了哲人对这一文类的鄙夷。“小说”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外物》：“夫揭竿累……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善用比兴，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来追求盛名，与追求玄妙的大道相比，可谓差之万里。”在他看来，“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故为“浅识之道”，谓之“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哲学至上的傲气。东汉时期，论家们沿用了诸子百家的遗训，桓谭就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就是说“小说”只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甚至班固也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是中国古代文艺史家对小说所做的最权威的界定，其行而上的习性和居高临下的神气溢于言表。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小说”才在危机四伏的中国争得“正史之根”的地位。可见，就定义者的态度和读者反应而言，用“小说”一词来翻译“novel”并不恰当。

“小说”一词所指甚广，五花八门的叙事散文皆可泛泛地称作“小说”，但是“它们仅有一个共同属性——用散文创作的长篇虚构作品。”^②除了界定小说的文体和篇幅外，这一权威的归纳还触及到了小说的本质——虚构性。小说捕捉人物的生活经验，通过艺术的虚构将其提炼为典型人物，从而反映特定环境中某些群体的生活状况的本质。但是，这一归纳不够全面，遗忘了“小说”的叙事属性，因为从整体上来说，“小说”都是借叙事来展现现实和阐明思想的。因此，就形式而言，“小说”大体上可以定义为“散文体长篇叙事作品”，这一定义全面体现了“小说”的三重属性——其“散文体”属性使之区别于韵律诗和无韵诗体（blank verse）戏剧，其篇幅的长度使之不同于短篇故

① 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页。

②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omson Learning, 2004, p. 190.



事 (story) 和中篇小说 (novelette), 其叙事性又使之有别于抒情诗歌 (lyric) 和散文。如果说前两重属性是从形式上进行分类的结果, 在小说批评中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第三重属性就是从内容上加以鉴别的成果, 是小说评述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说, 就内容而言, “小说” 是通过描写环境、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来反映现实的一种文学体裁, 是以人物刻画为中心、以故事叙述和环境描写为手段的一种文艺形式, 它包含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生活环境三大要素。

相对于其它文类而言, “小说” 可以呈现错综复杂的情节, 刻画性格各异的人物, 展现光怪陆离的环境, 这是 “小说” 叙事属性的一贯体现和功用。其三大要素中, 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的——诚如老舍先生在 “如何写小说” 的讲座中所言, “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人便没有事, 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 既然如此, 本书研究的重心就放在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人性的推求) 上——研究领域虽不新潮, 本书作者却自信能做到 “旧瓶装新酒”, 让 “老一辈” 和 “80 后” 都觉得愈久弥香。当然, 又如老舍先生所言, “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 故事情节和社会环境也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这两个要素是 “小说” 叙事属性和人物存在的必然要求。换言之, 本书评述的焦点离不开在故事情节和社会环境中显现的人物性格, 以及叙事的方式与背后的动力——作者的叙事艺术和创作思想。因此, 本书作者特别注重对 “小说” 进行以人物 (人性) 分析为重心的综合性研究——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不应该是片面的 “新批评” 或 “传记式批评”, 而应该是突出人物分析和背后的动力、兼顾文本情节和内外环境的批评, 一种灵活的、解释力更强的阐释。

在 18 世纪, 小说在中国尚未摆脱 “街谈巷语” 的尴尬境地, 在英国也没有上升为艺术的门类, 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放逐出来, 在象牙塔的偏僻中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 在约翰逊博士 (Samuel Johnson) 放弃权贵的庇护, 宣布成立自己的 “文人俱乐部” (Literary Club) 之前, 英国的小说作者大多还不是靠笔杆子挣面包的职业作家, 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业余写手。笛福是泛舟商海的老手, 直到年届花甲因投机买卖破产才奋笔疾书; 斯威夫特长期混迹于诡诈的政坛, 靠政客的小恩小惠糊口; 理查逊是给国会印刷政治册子的业主, 直到应邀编印《模范尺牍》时才文思泉涌; 菲尔丁先是由剧院走向法庭, 靠法官的俸禄养家; 斯特恩谋取了神职后才过上安稳的日子, 靠自我炒作成了社交场合的文坛红人; 只有公子哥儿华尔浦尔可以借老子的权



势，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古朴阴森的幽境……毕竟，这些小说先驱都不是爱尔兰的贵夫人格里高利（Lady Gregory）或美国的富婆斯泰恩（Gertrude Stein），继承了巨额遗产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从事“文字革命”（乔伊斯语）；相反，他们大都要谋取优厚的差事才能安生立命，才有闲暇著书立说。就文学的渊源而言，小说先驱的非职业化或业余性却是一桩幸事——他们没有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而是各怀目的地积极参与；作为参与的手段和成果，他们的小说集中反映了 18 世纪英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真正扮演了“正史之根”的角色。由此，托了文学“模仿论”（mimesis）的福，本书将社会环境列入探讨范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在 18 世纪之前，叙事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的情节“就是以过去的历史或传说为其基础的，作家处理情节的优劣也主要是按照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来加以评判的”，^① 这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古典主义。即使在 18 世纪，叙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新的] 正统的文学观念”——新古典主义——的禁锢，约翰逊和柏蒲（Alexander Pope）的文坛霸主地位，以及英国小说在世纪末才得以命名为“novel”这一事实，都是这种文学现象的反映。然而，也就是在 18 世纪，“文学上的传统主义第一次遭到了小说的全面挑战，”由于新的个人经验的涌现以及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兴起，“小说的基本标准”开始转变为“忠实于个人经验——总是独特因而新奇的个人经验”，^② 小说的情节“与先前文学形式之间”也呈现出“一个重大的差异：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其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③ 换言之，18 世纪的小说先驱大体上不再向古典文学谋取题材，而是“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创造出各式各样虽然缺乏“形式常规”却“新奇”

① 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第 6 页。

② 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第 6 页。书中“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这一译文是错误的。瓦特的原文是：“This literary traditionalism was first and most fully challenged by the novel, whose primary criterion was truth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individual experience which is always unique and therefore new.” 见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Penguin Books, 1981, p. 13. 因译著仍有生涩和错误之处，为准确起见，本书有时只能参照原著，由笔者自己译出，力求严谨、达意。

③ 同 1，第 6~7 页。



(novel) 或“富于独创性的”(original) 情节。^①可以说,称得上小说先驱的18世纪作家都是新情节或题材的新类型的开创者,其创新在18世纪英国小说专论中是不应回避的——其实,故事情节是小说作为叙事作品的自然产物,无论创作的年代,都是不可回避的。因而,虽然重心不在情节的创新性,本书也必须对英国小说先驱推出的情节进行分类探讨,彰显其“新颖性”或“独创性”。

兴许是巧合,本书重在人性探索或者人物分析——根据传统定义选定的措辞显得有些老土,恐怕只合“老一辈”的口味——的研究思路同黄梅研究员的力作是一脉相承的。在《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一书中,黄梅赞成伊恩·瓦特的“个人主义”观点,认为“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的作品确实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即对现代‘个人’的关注”,^②并断言说,“18世纪英国小说就‘自我’问题展开的反复推敲和切磋,实质上就是构建所谓‘现代主体’的过程,”^③因此黄梅又坦言道,她“将着重讨论小说中虚构人物的自我塑造,以及作者和他/她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如何通过这种人物形象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对话,从而影响受众的自我塑造。”^④其实,她所论及的“自我”、“主体”和“个人”就是对人性或小说人物所作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定,是从伊恩·瓦特的历史社会学观点迈向现代心理学观点的文字标识,其准确而“与时俱进”的“挂牌”也正是本书具体阐释人物形象或人性推求时要努力实践又有所突破的。有了这两座专论18世纪英国小说的里程碑,本书选定的“主攻”方向也就明确无误,而且有了充足、有效的“助攻”,有了和“80后”也来个“亲密接触”的话语媒介。当然,创新就是兴盛,重复就是灭亡,本书要“突破”的不是“18世纪英国小说对‘自我’或个体经验的史无前例的关怀”,^⑤而是18世纪英国小说人物的基本类型、人性特征、承载的价值观和对19世纪甚至20世纪小说人物和人性推求的预示。

伊恩·瓦特的经典和黄梅的力作是无法回避和难以超越的,但是存在就是

^① 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小说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7页。

^②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页。

^③ 同2,第9页。

^④ 同2,第8页。

^⑤ 同2,第9页。



不同，本书的构架和某些观点力争“新奇”——与其说是为了迎合“80 后”的新口味，不如说是为了能配得上“novel”这一赞美之词。《小说的兴起》的副标题“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就清楚地表明，历史社会学不太适用于斯威夫特、斯特恩等其他小说先驱的研究，因而瓦特似乎并不承认斯威夫特讽刺小说的创新性，对斯特恩的叙述游戏及其跟 20 世纪后现代小说的类似性也语焉不详，为本书留下了可以填补的空白。黄梅的力作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大家的作品分别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其视野之开阔、论述之精当、规模之宏大都是鄙人难以企及的。然而，拙著既没有按时间顺序对英国小说的先驱逐个评点，也无意充当“系统的 18 世纪英国小说史”，^①而是以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态势为构架，阐明各类小说的精神特质及其与后来小说的隐在关联，彰显小说人物背后的人性观，同时又挖掘出一条若隐若现的英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当然，这种线索在黄梅的力作中已有隐射：分析了 17 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分野后，黄梅指出，“复辟时代[的]文化与先前的传统有所断裂，却与其后的 18 世纪一脉相通。”^②

本书力图摒弃单一的传统批评模式，采用（后）现代批评理论对 18 世纪英国小说进行具体而又宏观的系统研究，拉开时间距离审视早期英国小说的成形过程与演化规律。20 世纪下半叶，国内的相关批评多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约束，推崇《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所采用的单一批评模式，不能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释。本著作从本体出发，既涉及文学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又采用比较新颖的（后）现代批评范式，对早期英国小说进行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系统研究，避免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等单一理论可能造成的狭隘性。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基于瓦特所忽视的另一类小说，基于黄梅所论的文学的“断裂”。果真如此，站在国内、国外两座里程碑的跟前，笔者便有所不同，便被感知，便存在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内对英国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8 世纪的早期现实主义和 19 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两个阶段，而且观点、角度比较陈旧，多采用单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故事背景、小说情节、人物形象、作者意图等进行传统的解读，尚不能在更高的层次对蕴涵在小说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挖

①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1 页。

② 同 1，第 21 页。



掘和阐释,为世纪之交的经典重读留下了许多空白。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开始有所突破,如李维屏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语》上发表文章,对斯特恩在《项狄传》中标新立异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评述,但我国学者整体上还未完全脱离传统的论述方式,不能就18世纪英国小说发展的两条隐含线索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阐释。21世纪初,相关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标志就是黄梅研究员在三联书店推出了《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这本厚实的专著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线索、文本解读、文化阐释和理论述评等方面做出了突破性贡献,是国内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而国外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是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该书细致而深刻地研究了18世纪英国社会现状与作者意图、文本内容的复杂关系,是深入了解早期英国小说的必读书籍。

在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书对隐含在文本中的早期英国小说发展成形(结构)和演化蜕变(解构)的线索进行细致和系统的研究,明确指出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方向,及其与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远亲关系。本书首先从盛行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道德改良运动和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出发,以主体的社会性和稳定性为历史线索,对英国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形过程进行详尽的论述,挖掘出同类小说演进的哲学基础(主体性)、必然规律(结构化)及其与先期宗教故事和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内在联系。这类小说主要包括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作品,它们体现了早期现实主义小说兴起、演变和成形的轨迹,具有主体稳定的理性主义共同特征,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直接源头。

首先,英国小说兴起的标志性作品是笛福的传记体商业冒险小说,这些小说描述的主要是以资本原始积累为最终目标的资本家主体。在海外殖民如火如荼的奥古斯都时代,这类主体虽然有晚年悔过的行为或一颗“分裂的心”,但其道德意识远没有危及其自身的稳定性,是商业理性时代的产物。随后,在道德改良运动中,擅长描述女性心理的理查逊以鸿篇巨制奠定了书信体言情小说的基础,刻画了英国小说中最早具有心理深度的女性主体。在婚姻道德和人格独立的矛盾中,这类主体经历了阶级之战、性别之战和家族之战的洗礼,体现出从商业道德迈向精神自由的发展趋势。在18世纪中叶,受到新古典主义浸润的菲尔丁将小说定义为“散文体喜剧史诗”,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做出了理论概括,标志着英国小说的正式成形。他的作品以描述“自然人性”见长,



是对理查逊人性观的反拨，在“人性”与理性的冲突中表现纷繁复杂的“世相全景”。在上述小说家的作品中，终极意义始终在场，理性作为结构原则从未受到真正的质疑，或者说，这类小说及其发展脉络体现了主体的稳定性和小说的结构化过程，形成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

但是，主体的稳定性和理性主义并不是 18 世纪英国所有重要小说的突出特征，与之相背而行的是对理性的怀疑、主体的异化、解构主义的萌芽、情感主义的盛行，小说结构在标新立异的叙事游戏中的解体，以及哥特小说、“蓝袜子”小说等非正统类型的兴起。这些“解构”现象主要体现在斯威夫特的游记讽刺小说和斯特恩的情感主义小说中。对此，本书尝试着从反理性主义、异化和解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角度，对这些特立独行的小说进行系统的重新解读，挖掘出早期英国小说发展的第二条脉络，打破 18 世纪经典作品阐释的僵局，为经典重读开辟新的途径。

首先，对斯威夫特及其作品，国内的评论多集中在其愤世嫉俗的人格特征和深刻入里的讽刺艺术，忽略了斯威夫特作为理性主义盛行时期第一个理性怀疑论者的地位，以及格列佛作为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异化人物的事实。实际上，在“状写人物性格不是讽刺小说的首要关注”的表象下，^① 作者表现了格列佛由自以为是理性人类向野胡异化的过程，并对所谓人类文明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解构，称得上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坚定的解构主义者。其次，对斯特恩标新立异的小说及创作意图，国内评论界持游戏性和后现代性两派观点，有作者意图决定文本意义的嫌疑和故意拔高、生拉硬扯的做作，忽视了情感主义思潮对文学理性主义的影响，或者叙事游戏在小说叙事结构刚刚成形时的开拓性意义。无论作者是否在有意识地进行叙事艺术的革新，他玩世不恭的叙事游戏客观上不仅体现了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而且显示了对刚刚成形的叙事传统的大胆解构。此后，小华尔浦尔在恐怖的怀古情绪中展开了对当代现实的间接批判，其对情感和想象的注重对于理性主义、其超自然因素对于现实主义都具有颠覆功能。而“蓝袜子”的崛起则对长期以来的男权主义和女性的失声无疑具有后结构主义功能。总的说来，斯威夫特、斯特恩及世纪末的小说具有反理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倾向，开辟了早期英国小说发展的第二条道路，或者说预示着“后现代”小说在遥远未来的诞生。

^①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112 页。